

# 浙江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 年代与归属献疑

张科<sup>1</sup> 陈焜<sup>2</sup>

(1.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2. 杭州市余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浙江杭州 311699)

**内容提要:**浙江临安牛上头墓地发现砖铭若干,有的带“关中侯谢氏”字样,表明谢氏即其墓主而非制砖造墓的工匠或督办丧事的僚佐。这是浙江地区六朝墓葬中难得一见的证据确凿的家族墓地。通过分析可知,该墓地肇始于东晋太宁三年(325年),延续至隋仁寿三年(603年),此“谢”并非陈郡阳夏谢氏,而可能系会稽山阴谢氏。迄今发现的东晋南朝家族墓地为数不少,但在地域分布上以南京地区为多,在墓地归属上以北来大族为主。即便是明确的南方士族墓地,其文化面貌亦多趋同于北来大族。临安牛上头墓地则不然,其墓主系南方士族,墓葬面貌几乎不见北来大族的影响,正是考察东晋南朝墓葬中南北差异的绝佳材料和突破口。

**关键词:**牛上头墓地 年代 东晋南朝 文化属性 会稽谢氏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临安於潜镇牛上头村发掘了15座砖室墓,墓葬壁砖多印有铭文。其中,带明确纪年者8座,带“谢造”“谢立”“谢氏”“谢氏建”字样者7座。发掘报告结合纪年铭文逐一判定了各墓葬的年代,并据“谢造”之类的铭文指出,牛上头墓地属“与谢衰一支有着密切关系”的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六朝时期陈郡谢氏的家族分布、迁徙、传承等方面的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sup>[1]</sup>实际上,报告对部分铭文的释读有误,对某些墓葬所属年代的认识也有失偏颇,牛上头墓地之归属亦非陈郡阳夏谢氏,而可能系会稽山阴谢氏。今试为论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一、墓葬铭文与年代考辨

牛上头墓地发现的15座墓葬中,带铭文者达11座,即M1、M5、M6和M8—M15。其中,M6、M9、M11—M15的铭文释读需作更正,M1的铭文虽释

读无误,然其年代却非报告所说的东晋。以下按墓葬编号逐次考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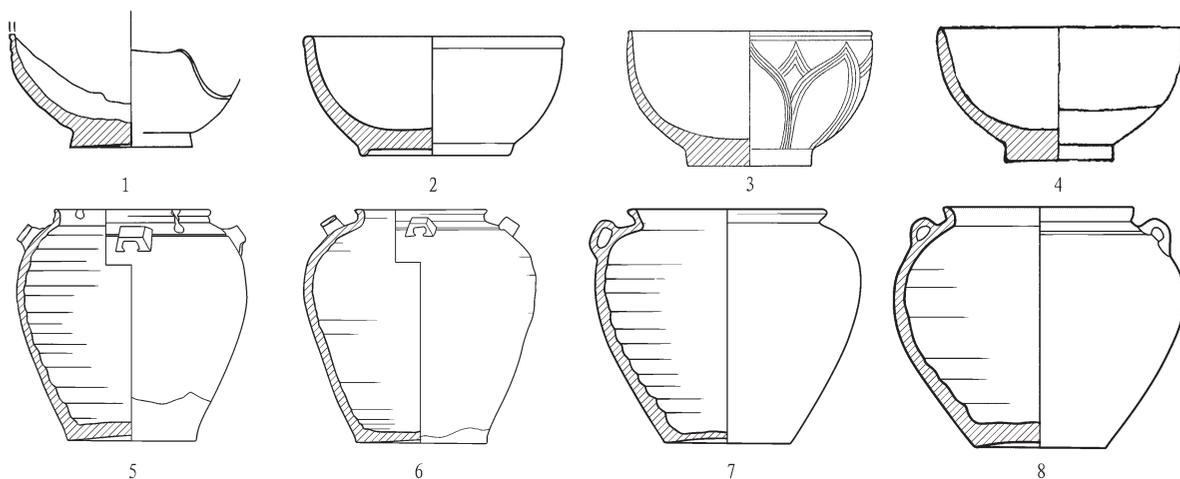
报告将M1的年代定为东晋,其依据在于该墓所出瓷碗(M1:3)与浙江慈溪窑头山M23所出者极为相似。诚然,牛上头M1:3与窑头山M23所出者皆为弧腹饼足碗,但前者之腹深和足高都较后者为甚(图一:1、2),故其年代应晚于后者。窑头山M23发现有“太元十六年”(391年)砖铭,年代应与之相当。不过,发掘简报亦敏锐地指出,“M23的随葬品……又与南朝初期墓葬接近”<sup>[2]</sup>。因此,牛上头M1所属年代应进入南朝。检索浙北、南京地区的南朝墓葬可知,形制与牛上头M1:3最为接近的瓷碗,莫过于南京石子岗M5:填土1和浙江嵊县M76所出者(图一:3、4)。嵊县M76发现有“禎明二年”(588年)砖铭<sup>[3]</sup>,石子岗M5为典型的南朝中晚期墓葬<sup>[4]</sup>,故牛上头M1的年代应在南朝中晚期前后。

收稿日期 2022-03-07

作者简介 张科(1991—),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瓷器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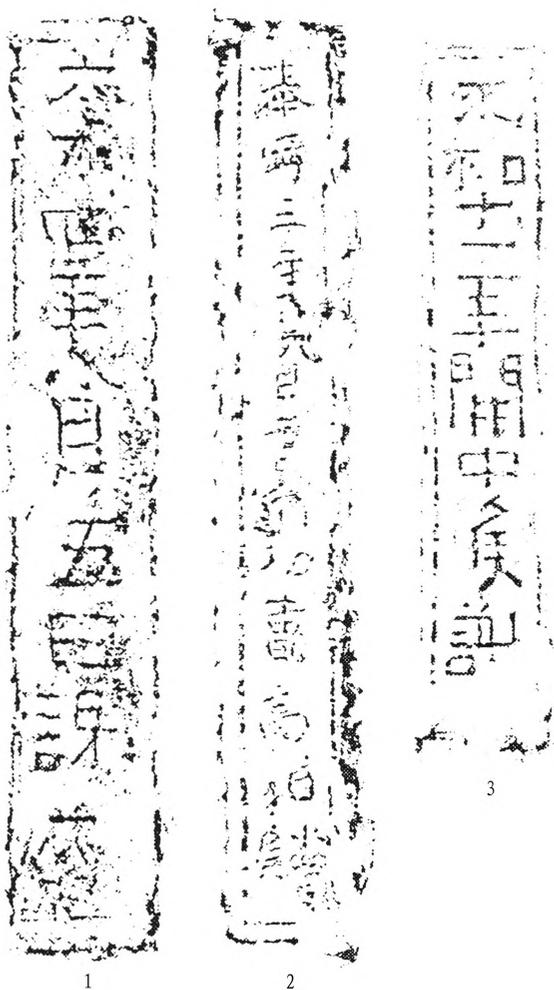
陈焜(1993—),男,杭州市余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六朝青瓷盘口壶生产与流通研究”(23FKGB004)的成果之一。



图一// 牛上头M1、M9、M10、M12、M13所出瓷器及其对比材料

1—4. 瓷碗(临安牛上头M1:3、慈溪窑头山M23出土、南京石子岗M5:填土1、嵊县M76出土) 5—8. 瓷罐(临安牛上头M10:3、M9:8、M13:2、M12:3)



图二// 牛上头M6、M11、M12砖铭拓片

1.M6“太元四年八月五日谢氏” 2.M11“泰宁三年九月二日府功曹高□□” 3.M12“永和十一年关中侯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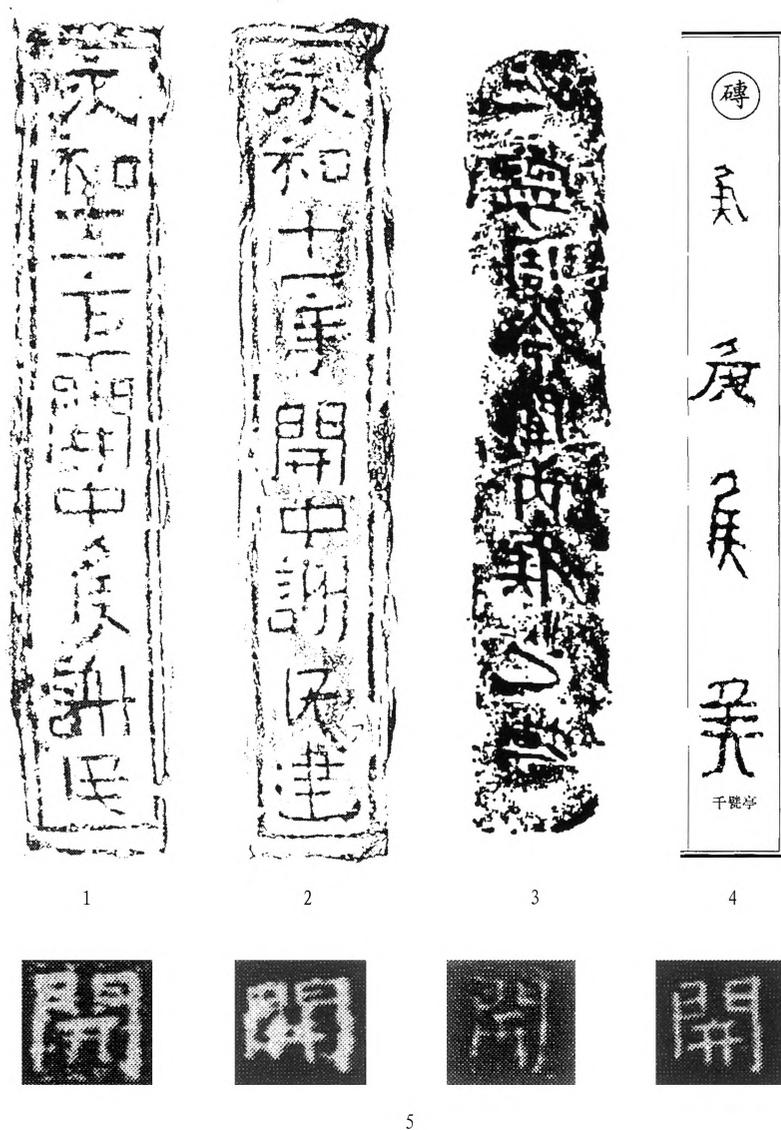
M6的墓砖铭文,报告释读为“太元四年八月五日□”。对照拓片可知,“日”字之后尚有“谢氏”二字(图二:1)。

M9的墓砖铭文,报告释读为“□□六年八月廿日谢氏”。参照M10的墓砖铭文“太元六年八月廿日谢氏建”,并充分考虑M9、M10所出瓷罐形制大小相似(图一:5、6),可推定“六年”之前应为“太元”二字。太元六年即381年,属东晋孝武帝朝,M9的年代应与之相当。

M11的墓砖铭文,报告释读为“奉宁三年九月二日□功曹高祖牧帝尾”“八月十五日作居”。对照拓片可知,“奉宁”宜识作“泰宁”,通东晋明帝之“太宁”<sup>[5]</sup>,而非报告牵强附会的“兴宁”;“□”应为“府”字,“喜”则系“曹”之误,府功曹即府衙之僚佐<sup>[6]</sup>;“高”之后的文字涣漫不清,权且存疑,但可推断为府功曹高氏之名,对于理解此条砖铭之文意影响不大(图二:2)。泰(太)宁三年即325年,M11的年代应与之相当。

M12的墓砖铭文,报告只释读了其中两方,即“宜君子”和反书的“永和八□八月廿三日谢氏建功”。另一方铭文砖,对照拓片,可释读为“永和十一年关中侯谢”(图二:3)。永和十一年即355年,M12的年代应与之相当。

M13的墓砖铭文,报告释读为“□平三年九月十日谢造”。瓷罐M13:2的腹部略深于M12:3(图一:7、8),表明M13的年代应略晚于M12,故“□平”应为紧随“永和”之后的“升平”。升平三年即359年,M13的年代应与之相当。



图三// 牛上头M14砖铭拓片中的“关”“侯”字及其对比材料

- 1.牛上头M14“永和十一年关中侯谢氏” 2.牛上头M14“永和十一年关中谢氏建”  
3.宜兴周墓墩M4“江宁周令关内侯之博” 4.《中国砖瓦陶文大字典》收录之“侯”  
5.《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收录之“关”

M14的墓砖铭文,报告释读为“永和十一年开中孙谢氏”“永和十一年开中谢氏建”“永和十一年八月一日谢氏建”。对照拓片可知,“开”字识作“关”字为宜(图三:1、2)<sup>[7]</sup>,《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收录的“关”字就有作如是形态者(图三:5)<sup>[8]</sup>,类似写法亦见于江苏宜兴周墓墩M4所出砖铭(图三:3)<sup>[9]</sup>;“孙”字则系“侯”字之误,类似写法者在《中国砖瓦陶文大字典》中就有收录(图三:4)<sup>[10]</sup>。关中侯是借用关中地名虚封的爵位<sup>[11]</sup>,永和十一年即355年,M14的年代应与之相当。

M15的墓砖铭文,报告释读为“永平三年八月十谢造”“永平二年八月日谢造”“永平三年八月一日开中孙谢立”“永平三年八月十谢造□□”。对照拓片可知,“开中孙”亦系“关中侯”之误,且其所属砖铭之年号并非“永平”,而系“升平”(图四:1),类似的“升”字在刘剡墓志就有发现<sup>[12]</sup>(图四:2);另一砖铭之首字不甚清晰(图四:3),识作“永”固无不可,然为“昇”的可能性不宜排除,类似写法在《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就有收录(图四:4)<sup>[13]</sup>。

那么,该如何取舍?报告以“永平三年”立论,认为“历史上有‘永平’年号的分别有东汉明帝、西晋惠帝和北魏宣武帝,西晋惠帝永平年号仅1年,可以排除,……5件钵中……M15:4这件钵为敛口,与余姚市湖山乡南朝墓M21所出器物相仿,具有南朝时期的特征,……因此,该墓所记年号应该是北魏宣武帝的年号,‘永平三年’即510年”。抛开南朝疆域内的临安牛上头何以会使用北魏年号不论,仅就M15:4(图五:1)的时代特征而言,报告的认识就值得商榷。余姚湖山乡南朝墓M21所出器物有青瓷盏和盘口壶,可与临安牛上头M15:4作比较

者应系M21:1(图五:2)。两者的口部特征的确相似,但在腹部深度和底足形态上差异显著。而六朝青瓷钵的类型学分析表明,敛口只是其诸多型别中的一种,不能作为式别划分的依据。相反,腹部加深、平底过渡为饼足,才是此类器物演变的整体趋势<sup>[14]</sup>。因此,临安牛上头M15:4的年代绝不会晚至南朝。相应的,M15属南朝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至于其具体年代,还得综合随葬品和墓砖铭文、纹饰加以考量。M15所出瓷钵中,M15:3腹部最深(图五:3),与温州瓯海区M1(367年)所



图四// 牛上头M15砖铭拓片中的“升”字及其对比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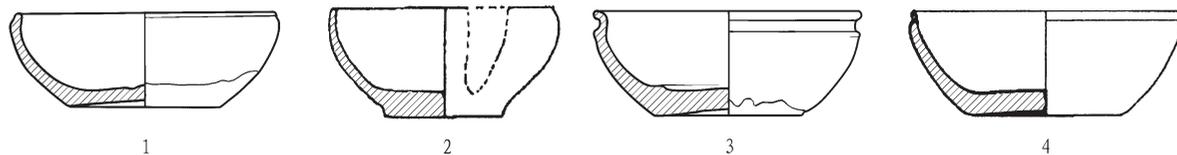
1.牛上头M15“升平三年八月一日关中侯谢立” 2.镇江刘剋墓志 3.牛上头M15“升平三年八月十日谢造” 4.《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收录之“昇”字

出瓷碗M1:3(图五:4)<sup>[15]</sup>形态相似,年代应与之相当;墓砖铭文中,带“关中侯谢立”者之纪年为升平三年(359年),正与前述随葬品指向的年代基本吻合;墓砖纹饰皆为孙吴西晋时期即已出现或流行于浙北地区的式样<sup>[16]</sup>,不见该区南朝墓葬始见的宝相花或莲花,亦与上述认识并行不悖。凡此种种,表明M15的年代应在359年前后,故“永平三年八月十日谢造”之“永”字,应识作“昇”为妥。如此,上揭M15的两方砖铭拓片中,年号之后皆为“三年八月”,亦即年月完全一致的现象,方可得到合理解释。

剩余7座墓葬的年代可依发掘报告的意见。为便于后文讨论,兹将这15座墓葬的年代标注于牛上头墓葬分布示意图(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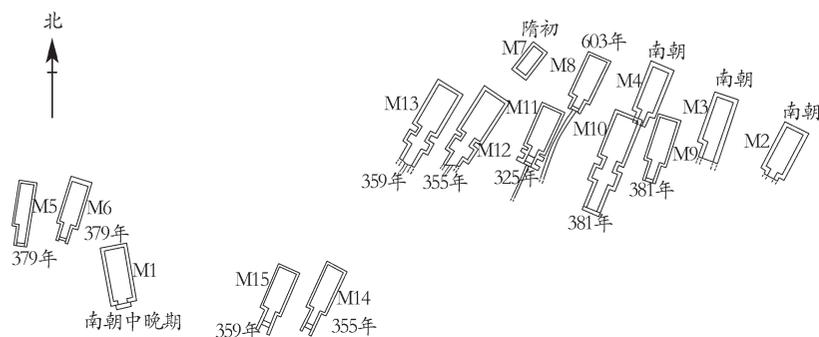
## 二、墓地特征与文化属性

牛上头墓地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于其出土了若干带“谢氏”字样的铭文砖。前贤研究表明,砖铭所涉人名或姓氏的身份比较复杂,包括“制砖或筑墓工匠、墓主人、墓主后裔或仆从、墓砖监制官员等”<sup>[17]</sup>。因此,仅凭“谢氏”之类的铭文,尚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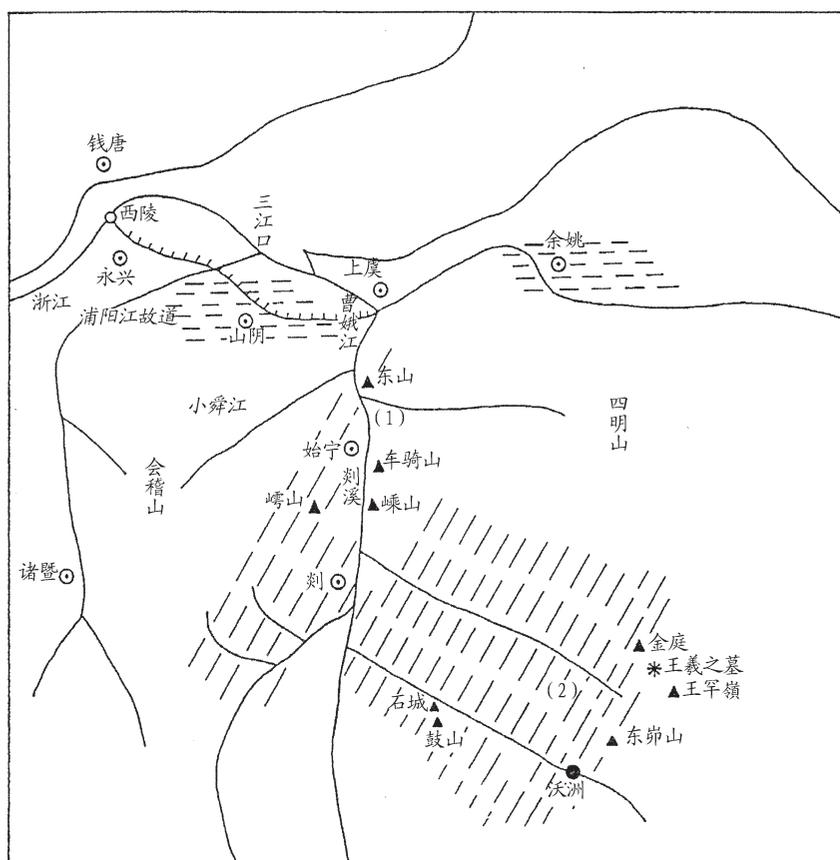


图五// 牛上头M15所出瓷器及其对比材料

1、2.瓷盖(牛上头M15:4、余姚市湖山乡M21:1) 3.瓷钵(牛上头M15:3) 4.瓷碗(温州瓯海区M1:3)



图六// 临安牛上头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附年代)



注:

≡≡≡ 会稽土著豪门士族主要居住区

//// 北方士人分布区

(1) 东山—车骑山—嵯山 陈郡阳夏谢氏主要居住区。

(2) 金庭—鼓山 琅邪王羲之一门主要居住区。

图七// 东晋潮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王志邦《东晋潮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研究》,第289页)

以证实谢氏为牛上头墓地之主人。不过,姓氏前(后)带官职或地名者,往往可以肯定为墓主<sup>[18]</sup>。然而,这种观点也不能一概而论。官职性质不同,其所属姓氏或人名的身份判然有别。如江苏宜兴周墓墩M1的砖铭为“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阳羨所作周前将军砖”“元康七年九月廿日周前将军……”“议曹朱选将功吏杨春工杨普作”,报告指出,议曹朱选是辅佐郡守主持参谋议论的属吏,将功吏杨春估计是地方政府管理工程的官名,杨普可能是一位有名的建筑匠师,而M1则是“经地方政府亲自督造,名匠承建”的平西将军周处之墓<sup>[19]</sup>。类似现象尚可见于江苏吴县狮子山M2,其砖铭为“元康三年四月六日庐江太守东明亭侯主簿高勳作”<sup>[20]</sup>,表明它是主簿高氏帮办的东明亭侯之墓<sup>[21]</sup>。议曹、主簿与功曹相似,均为六朝地方行政机构之属吏<sup>[22]</sup>,由此可推知牛上头M11“府功曹高□□”砖铭之含义,大概也不出佐吏高氏督办丧事的范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上头M12、M14和M15的砖铭中,“谢”字前所贯之“关中侯”并非僚佐属吏,而系与前述东明亭侯相似的爵位。迄今所见的六朝砖铭中,带爵号者另有南京江宁沙石岗墓之“天册元年七月十八日兒侯李横作甃”<sup>[23]</sup>、杭州老和山墓之“晋兴宁二年吴郡嘉兴县故丞相参军都乡侯褚府君

墓”<sup>[24]</sup>和宜兴周墓墩 M4 之“江宁周令关内侯之塿”<sup>[25]</sup>,其墓主皆为享此爵位者本人。换言之,拥有爵位而为他人(即亲属之外的人)督办丧事的现象,在六朝考古发现中绝无一见。因此,“关中侯谢氏”之类的铭文足以证明,牛上头墓地所见之“谢”即其墓主姓氏。牛上头 15 座墓葬中,砖铭带“谢”字者共计 8 座,即 M14、M15、M6、M9、M10、M12、M13 和 M8。剩余 7 座虽不出铭文砖,或砖铭不带“谢”字,但与前述 8 座墓向基本一致,相互之间又无打破关系,故可推断它们属同一家族,即谢氏家族。

牛上头墓地的主体年代为东晋中期至南朝,但其肇始年代却可早至东晋太宁三年(325 年),M11 发现的“泰宁三年九月二日府功曹高□□”砖铭即为力证。至于其年代下限,当在 M8 砖铭所书的“仁寿三年”(603 年)前后。从墓地布局上看,这批墓葬似系采取两两成组的方式构筑而成,组别明确者至少有 M5、M6、M9、M10、M12、M13,以及 M14、M15 八座(图六)。同一组别的墓葬,不仅地理位置毗邻,年代、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方面也是共性居多。不同组别在位置分布上缺乏明显规律,突出表现为 M12、M13 和 M14、M15 年代相当,皆在 355 年、359 年前后,然而前者位居坡北高地,后者却地处坡底。墓葬年代与其所处位置关系不强的现象,在 M1、M11 和 M8 上亦有体现。三者分别位于墓地之第一、三、四行,但其年代却为南朝中晚期、东晋早期(325 年)和隋初。可见,牛上头墓地并未作整体规划,其营匠的核心思想为两两成组,至于组与组之间的关系,却不及考虑或者说考虑不多。

纵观这批墓葬的面貌特征,大致可分作东晋、南朝隋初两个阶段。东晋墓葬 9 座,包括 M5、M6 和 M9—M15,砖室平面以“凸”字形为主,横前堂纵后室者次之,刀形最少;墓葬结构上,皆券顶,壁砖错缝平砌而成,地砖绝大多数作“人”字形斜铺,个别错缝平铺;附属设施上,不设棺床、祭台和直棂窗,偶见壁龛和灯台;墓砖纹饰上,既有钱纹、叶脉纹、几何纹、梳篦纹、对角三角纹等花纹,又见鱼纹、龙纹、虎纹等画像;随葬品方面,流行瓷质器皿,偶见陶质和金银铜铁实用器。南朝隋初墓葬 6 座,即 M1—M4 和 M7、M8,砖室平面以“凸”字形为大宗,长方形和刀形少量;墓葬结构上,皆券顶,壁砖样式以三顺一丁为大宗,个别错缝平砌,地砖绝大多数作“人”字形斜铺,个别错缝平铺;附属设施上,普遍设壁龛,不见棺床、

祭台、直棂窗和灯台;墓砖装饰上,有钱纹、鱼纹、几何纹、叶脉纹和宝相花纹;随葬品方面,亦流行瓷质器皿,偶见陶质和铜铁实用器。

发掘报告在判定牛上头墓地属陈郡谢氏后,对其文化面貌作了简要分析,指出“横前堂后室墓的发现为六朝时期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资料,……‘凸’字形墓的墓壁均较平直,未见南京等地区东晋晚期至南朝时所常见的墓壁弧曲现象,这也是牛上头墓地的特殊之处”。其实,不仅是墓葬形制,在墓葬结构、附属设施和墓砖纹饰等方面,除南朝开始出现的宝相花纹外,牛头山墓地亦罕见南京地区<sup>[26]</sup>影响的明显证据。相反,横前堂纵后室墓显示了强烈的“本土性”。此一形制在中原地区始见于西汉晚期<sup>[27]</sup>,浙江地区出现于东汉晚期<sup>[28]</sup>,典型代表如奉化白杜熹平四年(175 年)墓<sup>[29]</sup>。此后的孙吴西晋时期,江浙地区仍有发现,如嵊县大塘岭 M101(257 年)、M95(263 年)<sup>[30]</sup>、安吉天子岗 M2(285 年)<sup>[31]</sup>、吴县狮子山 M2(293 年)<sup>[32]</sup>和余杭义桥 M1<sup>[33]</sup>。其中,嵊县大塘岭 M101 出有“砖墓志”,表明其墓主为“建中校尉会稽剡番(潘)亿”;安吉天子岗 M2 的墓主被推定为丹阳故鄣朱琬<sup>[34]</sup>;发掘报告认为,吴县狮子山 M2 的墓主很可能是来自北地郡泥阳县的傅长虞及其家属,韦正先生论证了此说之缪<sup>[35]</sup>。就随葬品而言,牛上头墓地罕见陶器,与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中陶器频出的现象<sup>[36]</sup>截然不同,反倒与浙江地区同时期墓葬<sup>[37]</sup>相似。总之,从文化属性来看,牛上头墓地应归于浙江本地,而非陈郡谢氏家族墓地所属的南京地区<sup>[38]</sup>。

### 三、墓地归属探析

诚然,墓地归属与其文化属性不能完全等同,但也并非毫无关系。一般来说,前者的身份地位、文化背景、思想观念甚至是个人爱好,往往会经意或不经意地作用于后者,遂使后者成为探索前者的重要线索和依据。牛上头墓地几乎不见南京地区谢氏家族墓地的文化因素,至少提示我们,其属陈郡谢氏的观点值得斟酌。审视报告,不难发现,其立论依据有二:第一,墓地发现的 15 座墓葬中,7 座的砖铭有“谢”“谢造”“谢氏”“谢建”等字眼;第二,陈郡谢氏部分族人曾定居于会稽,牛上头墓地所在的临安位于浙江西部,与会稽郡(绍兴)相去不远。然而,王志邦的研究表明,会稽土著豪门士族与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在地域分布上泾渭分明,前者聚居于平原地区的山阴、余姚两县,其中余姚“是西晋末年以来形成的一个

强有力的点。这就等于筑成一堵遏制北方士人向余姚以东平原地区(句章、鄞、鄞诸县)流动的堡垒”;后者集居于剡溪——曹娥江流域的剡、始宁、上虞诸县,此处本地土著豪门士族势力薄弱,恰能避免引发侨土冲突(图七)<sup>[39]</sup>。据图七分析,陈郡谢氏集聚地位于会稽郡治所山阴(今浙江绍兴)之东南,而众所周知,临安市却在绍兴之西北,二者相距较远。再者,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肇始于东晋太宁三年(325年),其时陈郡谢氏虽已渡江南来,然就地域选择而言,却是以豫章为早,建康、豫州为重。“依靠谢氏在豫州的实力,谢氏家族得以对建康也即东晋中央政府施加影响,……得以在会稽购田置地,殖产兴业,维系整个家族的发展。”<sup>[40]</sup>而在盘踞豫州之前,纵然有学者据晚出的文献,如唐广明元年(880年)之《谢氏族谱》和宋绍熙五年(1194年)之《谢氏旧谱序》认为,谢衡曾带领部分族人去会稽定居,谢安兄弟辈是在会稽长大成年的<sup>[41]</sup>,陈郡谢氏也似乎未在此形成家族墓地。验诸谢衡三子的葬地,长子谢鲲之墓(324年),现已发现于南京戚家山<sup>[42]</sup>;次子谢衰之墓,据《世说新语·任诞篇》推知,和谢鲲在同一处<sup>[43]</sup>;三子谢广于史籍无载,仅见于谢鲲墓志。田余庆先生进一步指出,“谢鲲子侄可能依先人冢侧为葬……灵运祖父玄琬均葬会稽始宁,而不在建康,当因谢玄经营始宁山居之故<sup>[44]</sup>。总之,将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归为陈郡谢氏,在年代、地域分布和文化属性上均存在矛盾,是故不能成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牛上头 M14 发现的砖铭中,有一方的“关”字酷似“开”字,或者说就是“开”字(图三:2)。笔者曾采纳报告意见,将类似字形皆识作“开”,并试图从 M14 所见的“开中侯谢氏”和“开中谢氏”砖铭入手,探究牛上头墓地的归属。考虑到六朝家族特重门第,普遍于姓氏前贯以郡望原籍<sup>[45]</sup>,笔者先是认为“开中”很可能即谢氏之籍贯;又联系两晋侯爵的称号和命名习惯,侯爵分郡、县、乡、亭四级,郡、乡、亭侯之爵号中皆带“郡”“乡”或“亭”字,县侯则不然<sup>[46]</sup>,据此判定“开中侯”应为一县侯,开中当系一县名。然而系统检索《中国历代地名大辞典》和《历代地理沿革表》等书籍,均未发现“开中县”这一地名。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 M12、M14、M15 砖铭中的所有“开”字,并结合前揭“关”字的异体写法,舍“开”从“关”,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顺理成章了。如此,“关中侯谢氏”可得到合理解释,而“关中谢

氏”则应是省字之作或漏字之误,绝非姓氏前贯以郡望原籍的常例。相应的,牛上头谢氏家族之籍贯也就无从得解。

饶有趣味的是,发掘者提及的绍兴,在东汉晚期即有一支会稽山阴谢氏,其代表人物谢夷吾就曾崭露头角于彼时的政治活动中。孙吴时期,会稽谢氏已晋升为江东高门大族,且与孙吴政权关系较为密切;入晋之后,又有谢奉、谢聘、谢輶、谢端、谢凤、谢行言、谢胜、谢鍼、谢敷、谢沈等十余人,皆为会稽谢氏。其中,谢行言“服膺儒教,足为公望”,号为“南金”,而谢輶则与琅琊王茂并誉为“南北之望”<sup>[47]</sup>。较之陈郡阳夏谢氏,会稽山阴谢氏为临安牛上头墓地之主人更为合理。除年代与文化属性上相吻合外,侨、吴势力的地域分布情况亦可辅证。临安市所在的吴兴郡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吴人势力强盛之地”,而据陈先生的观点,包括陈郡谢氏在内的北来大族难以在此立足,否则便有引发侨土冲突之隐患,进而动摇江左政权之根基<sup>[48]</sup>。当然,也就遑论持续时间较长的家族墓地了。相反,会稽山阴谢氏却不存在上述抵牾。不可否认,会稽山阴谢氏何以会葬于吴兴郡之临安,尚因史载阙如而无从得知,目前亦无法作出圆满解答。不过,安徽马鞍山发现有会稽山阴谢沈家族墓地<sup>[49]</sup>,表明会稽山阴谢氏曾有过一定幅度的地域迁徙,临安牛上头墓地或许就是其迁徙的另一例证。

#### 四、结语

本文对临安牛上头墓地 15 座墓葬作了系统检视,纠正了发掘报告关于部分砖铭和某些墓葬年代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牛上头墓地的面貌特征,廓清了墓地的性质和文化归属,并据此认为其墓主并非陈郡阳夏谢氏,而系南方谢姓土著,以会稽山阴谢氏的可能性最大。迄今发现的东晋南朝家族墓地为数不少,但在地域分布上以南京地区为多,在墓地归属上以北来大族为主<sup>[50]</sup>。即便是明确的南方士族墓地,其文化面貌亦多趋同于北来大族,以至于“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身份标识物出土,我们几乎无法单从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来判断一座墓葬的族属”<sup>[51]</sup>,尤以高崧家族墓表现得最为明显<sup>[52]</sup>。临安牛上头墓地则不然,其墓主系南方士族,墓葬面貌几乎不见北来大族的影响,正是考察东晋南朝墓葬中南北差异的绝佳材料和突破口。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白彬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洪财

副教授的帮助,并此致谢!)

- [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临安市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21—453页。
- [2] 慈溪市文管会等:《浙江慈溪窑头山东晋纪年墓清理》,《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
- [3] 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六朝墓》,《考古》1988年第9期。
- [4]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5期。
- [5] 六朝纪年砖铭中,“太”写作“泰”字者颇为常见,相关例证参见a. 葛治功:《南京西善桥东晋泰和四年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b. 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东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 [6] 唐·房玄龄:《晋书》卷一四《职官志》,中华书局2015年,第745—747页。
- [7] 单就砖铭上的字形而言,识作“开”或“关”皆可。此处舍“开”从“关”,理由后详。
- [8]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中华书局2014年,第284、285页。
- [9] 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
- [10] 陈建贡:《中国砖瓦陶文大字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第93页。
- [11] 李蔚然:《南京出土关侯印考略》,《东南文化》1985年总第1辑。
- [12] 镇江市博物馆:《镇江市东晋刘彪墓的清理》,《考古》1964年第5期。
- [13] 同[8],第789页。
- [14] 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7页,图五。
- [15] 施成哲:《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发现东晋纪年墓》,《考古》2010年第6期。
- [16] 同[14],第259—262页。
- [17] 王结华:《宁绍平原六朝墓砖铭文分类解读》,《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 [18] 华国荣:《六朝墓文字砖的归类分析》,《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 [19]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 [20]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1] 韦正:《简论西晋时期的南北士族墓葬》,《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 [22] 胡阿祥:《六朝政区》,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128—136页。
- [23] 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
- [2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晋兴宁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
- [25] 同[9]。
- [26] 关于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葬之形制、结构、附属设施与墓砖纹饰,参见a.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33、40—48页;b. 罗宗真等:《六朝文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124、277—279页。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58、68—82、233、239页。
- [28] 黎毓馨:《浙江两汉墓葬的发展轨迹》,《东方博物》第9辑,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
- [29] 奉化县文管会:《奉化白杜汉熹平四年墓清理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08—211页。
- [30] 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 [31] 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
- [32]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33]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余杭义桥汉六朝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06—151页。
- [34] 张秋华:《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东南文化》2017年第4期。
- [35] 韦正:《简论西晋时期的南北士族墓葬》,《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 [36] a. 谢明良:《从阶级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1998年第5期;b. 同[14],第158、283、300页。
- [37] 关于浙北乃至浙江地区东晋南朝墓葬的随葬品组合情况,参见郑睿瑜:《浙江地区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51、52页。
- [38] 韦正:《东晋墓葬制度的考古学分析》,《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
- [39] 王志邦:《东晋朝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研究》,〔日〕谷川道雄编《日中国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第279—290页。
- [40] 刘新光:《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 [41] 周昌梅:《六朝陈郡谢氏世系、郡望及迁居考论》,《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42]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戚家山东晋谢鲲墓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
- [43] 孙玮玥:《谢尚与东晋豪族谢氏崛起研究》,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9页。

- [4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
- [45]同[22],第245—247页。
- [46]闫鹏:《两晋爵制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1—58页。
- [47]a.黄惠贤:《南北朝前有关谢氏家族的几个问题初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b.方北辰:《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天津出版社1999年,第10、11页;c.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d.姚培锋:《会稽大族与两晋士族政治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 [48]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0年,第55—77页。
- [49]马鞍山市博物馆:《马鞍山市马钢二钢厂东晋谢沈家族墓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
- [50]滕雪慧:《长江中下游六朝士族田庄经济的考古学观察》,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36—140、143、159—161页。
- [51]刘中伟:《中国东南六朝墓葬与民族变迁》,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42页。
- [52]邹忆军:《高崧父子生平考——兼谈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

##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Xie Family Cemetery in Niushangtou, Lin'an, Zhejiang

ZHANG Ke<sup>1</sup> CHEN Kun<sup>2</sup>

(1. Yue 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2. Hangzhou Yuhang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fice, Hangzhou, Zhejiang, 311699)

**Abstract:** Several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Niushangtou Cemetery in Lin'an, Zhejiang. Some of the bricks bear the phrase "Marquis Guanzhong Xie", indicating that the Xie family is the tomb owner rather than the craftsmen or aides oversee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ck tombs. This is a rare and well-documented family cemetery during Six Dynasties in the Zhejiang region.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cemetery dates back to the third year of the Taining perio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25 AD) and continued until the third year of the Renshou period of the Sui Dynasty (603 AD). The Xie family in this case is not related to the Xie family of Chen County in Yangxia bu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Xie family of Kuaiji of Shanyin. Numerous family cemeteries from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have been found, with the majority located in the Nanjing area and mainly attributed to prominent northern families. Even in clearly identified southern aristocratic family cemeteries, thei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ten tend to resemble those of the prominent northern clans. However, the Niushangtou Cemetery in Lin'an is distinct; its tomb owners belong to southern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the burial style shows little influence from the northern clans. Therefore, it serves as an excellent material and breakthrough point for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burial customs during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Key words:** Niushangtou Cemetery; dating;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ultural attribution; Xie family of Kuaiji

(责任编辑:张平凤;校对:黄苑)

## 『東南文化』2023年第6号主な論文の要旨

1. 移動不可文物の仮想現実展示方法に関する新論—デジタル・アート特別展「彫画漢韻：漢夢を探る旅」を例として(柴秋霞 鄧又溪)

要旨: デジタル展示の創造性は「身体在场」に基づく移動不可文物の展示論理に制約されていることはすでに明らかであり、今は「身体在场」を中心とする復元と交互展示から、もっと主体的な転場体験を中心とする文化内容の創造展示に邁進せねばならない。移動不可文物のデジタル展示方法を探る新しい論理として、「具身転場」はメディア現れに基づく転場と、社会経験に基づく転場と、体験遷移に基づく転場からなっている。文物に面するデジタル・アートの創作は、デジタル技術がヒトとモノ(文物)のインタラクションにもたらした潜在的制限を解消し、デジタル的なインタラクションに社会的なインタラクションの内容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キーワード: 仮想現実 転場 移動不可文物 生かして利用 デジタル・アート

2. 広州市黄埔区百草崗東晋墓M2、M7発掘概報(広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要旨: 2013年、広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は広州市黄埔区百草崗で東晋の墓2基を発掘した。両墓はいずれも墓道付きの双墓室煉瓦墓で、平面は「中」字形を呈し、封門、甬道、前室、後室、券頂などの構造が比較的完備に保存されており、規模が大きく、複雑な形をしている。出土した副葬品は23点(セット)で、青磁四系壺、碗、盒、硯、滑石豚などがある。両墓は東晋墓の特徴と南朝墓の特徴を併せ持ち、東晋から南朝までの初期の過渡期の墓の形制を反映している。広州地区の六朝時代の墓の時期、形制、葬儀習俗などを研究するために新しい実物資料を提供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広州 東晋 墓葬 青磁

3. 江蘇省蘇州板橋村呉越国李氏夫婦墓発掘概報(蘇州市考古研究所)

要旨: 2021年3月から8月にかけて、蘇州市考古学研究所は、蘇州工業園区板橋村付近の2つの地域を調査した。Ⅱ区において、同じ封土堆下三座に堅穴土坑墓を発見し、同茔异穴だ。出土遺物は漆器、木俑や金属器、买地券などがあり、一部の漆器に「姚先上牢」「丁卯徐上牢」「何牢」などの銘文がみられる。買地券によると、男性の墓主は李姓で、埋葬年代は西暦966年、呉越国末期だ。これら3つの墓から出土した器物の種類が豊富で、紀年が明確で、蘇州地区の五代墓研究に重要な材料を提供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蘇州 呉越国 買地券 木俑

4. 浙江省臨安牛上頭謝氏家族墓(張 科 陳 焜)

要旨: 臨安牛の上の墓地には煉瓦の銘がいくつか発見され、あるものは「関中侯謝氏」の字を持っていて、謝氏はその墓の主であって煉瓦の墓を作る職人や葬儀を監督する僚佐では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これは浙江地区の珍しい証拠のはっきりした家族の墓地だ。この墓は東晋の太寧3年(325年)に始まり、隋代の仁寿3年(603年)まで続いており、この「謝」は陳郡陽夏謝氏ではなく、会稽山陰謝氏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れまで発見された東晋南朝家の墓地は少なくないが、地域分布では南京地区が多く、墓地の帰属では北来大族が主だ。はっきりとした南方土族墓地でも、その文化的様相は北来大族と共通している。臨安牛の頭の墓地はそうではなくて、その墓の主は南方の土族で、墓の様相はほとんど北来の大族の影響を見ないで、まさに東晋の南朝の墓の中で南北の差異を考察するすばらしい材料と入口だ。

キーワード: 牛上頭墓地 年代 東晋南朝 文化属性 会稽謝氏

5. ニューメディア文脈における博物館真実性の伝播策略(郭美廷)

要旨: 博物館の独特性を測る基本的標準は真実性である。伝統的な博物館文脈において、真実性は文物そのものに深く関わっている一方、無形伝播のニューメディア文脈において、真実性の伝播方法は文物、観客、博物館という三つのレベルで変化が起り、つまり文物の情報が疑われ、観客の特徴が見落とされ、博物館の解釈が論争される問題である。それに鑑み、ニューメディア文脈における博物館真実性の伝播は再現・構築・脱構築・再構築という四つのレベルで進行できる。文物価値の発掘・時間的叙述の強化・観客想像の分析・信頼共同体の構築などの措置により、公衆の感覚真実性が適化され、大衆文化のサービスレベルが向上し、ニューメディアを文物情報の伝播・文化伝承の発展・中国精神の凝集に寄与する重要陣地にならしめることを更に進めることもできる。

キーワード: 博物館伝播 ニューメディア 真実性 観客

(翻译: 黄建秋)

## 『東南文化』2023년 제6기 주요 논문 제요

1. 「이동불가문물의 가상현실 전시 방식에 대한 새로운 탐구 - 디지털아트 특별전 ‘雕畫漢韻-한나라의 꿈을 찾아가는 여정’을 예로 들어」(柴秋霞, 鄧又溪)

제요: ‘身體在場(presence of the body)’에 기반한 이동불가문물의 전시 논리는 디지털 전시의 혁신을 분명히 제약하고 있으며 물리적 존재 중심의 환원 및 상호 전시에서 보다 적극적인 현장 체험 중심의 문화 콘텐츠로 구성되는 혁신적인 전시로 전환되어야 한다. 이동불가문물의 디지털 전시 방식을 탐구하기 위한 새로운 논리로서 ‘具身轉場(embodied transfer)’에는 매체 기반 전시, 사회적 경험 기반 전시 및 경험적 이동 기반 전시로 구분된다. 문화 지향적인 디지털 예술의 창작은 디지털 기술로 인해 발생하는 사람과 문물간의 상호작용에 대한 잠재적인 한계를 해소하고 이러한 디지털 상호작용을 사회화하기 위한 본질적인 내용을 부여할 수 있다.

핵심어: 가상현실(virtual reality), 전환, 이동불가문물, 활성화 및 활용, 디지털아트

2. 「廣州市黃埔區百草崗東晉시기 무덤 M2, M7 발굴 보고」(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제요: 2013년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은 廣州市黃埔區線坑村百草崗에서 東晉시기 무덤 2기를 발굴하였다. 두 고분은 모두 묘도가 있는 이중 묘실 전실묘로 평면은 ‘中’字形으로 봉분, 용도, 전실, 후실, 권정 등의 구조가 비교적 완전하게 보존되어 있으며 규모가 크고 형체가 복잡하다. 매장 기물은 청자사이호(靑瓷四系罐), 완, 합, 버루, 滑石猪 등 23점이 출토되었다. 무덤 2기는 東晉시기 묘장의 특징과 함께 南朝묘의 일부 특징을 가지고 있는데 이는 東晉에서 南朝초기로 넘어가는 과도기의 묘장 형제를 반영하는 것으로 廣州지역 六朝시기 묘장의 시기 구분, 형제 및 장례 풍습 등을 연구하는 데 새로운 실물 자료를 제공하였다.

핵심어: 廣州, 東晉, 고분, 청자

3. 「江蘇省蘇州板橋村吳越國李氏부부 무덤 발굴 보고」(蘇州市考古研究所)

제요: 2021년 3월부터 8월까지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는 蘇州工業園區板橋村 근처 부지 두 곳에 대한 고고 발굴을 진행하였다. 그 중 II 구역의 같은 봉토 아래에서 수혈식 토강묘 3기가 발견되었다. 이는 동묘이혈 합장묘로 칠기, 목용, 금속기 및 매지권 등의 부장품이 출토되었으며 일부 칠기에는 “姚先上牢”, “丁卯徐上牢”, “何牢” 등의 명문이 보인다. 매지권의 내용에 따르면 묘주는 李씨 성의 남성이며 매장 연대는 서기 966년으로 吳越國말기에 속한다. 3기의 무덤에서 다양한 기물이 출토되었으며 그 연대가 명확하여 蘇州지역 五代시기 고분 연구에 중요한 자료를 제공하였다.

핵심어: 蘇州, 吳越國, 매지권, 木俑

4. 「浙江臨安牛上頭謝氏 가족묘지에 관한 의문」(張科, 陳焜)

제요: 臨安牛上頭 묘지에서는 벽돌 명문이 몇 개 발견되었는데 일부에는 ‘關中侯謝氏’라는 글자가 있어 謝氏가 무덤을 만들기 위한 벽돌을 만든 장인이나 장례를 감독하는 보좌관이 아니라 묘주임을 분명히 나타낸다. 이는 浙江 지역에서 드물게 명확한 증거를 가지고 있는 가족묘지이다. 분석에 의하면 이 묘지의 건설은 東晉太寧三年(325년)에 시작되어 隋代의 仁壽三年(603년)까지 진행되었으며 이 ‘謝’는 陳郡陽夏의 사씨가 아니라 會稽山陰 사씨로 추정된다. 지금까지 東晉南朝시기의 가족묘지는 다수 발견되었으나 지리적 분포상 남경 지역에 가장 많고 대부분의 묘지는 북쪽에서 내려온 가문의 것이다. 명확한 남방의 사족 묘지도 그 문화적 면모는 북쪽에서 내려온 가문의 것과 동일하다. 그러나 臨安牛上頭 묘지는 이와 달리 묘주는 남방 사족으로 그 문화적 면모 역시 북쪽에서 내려온 가문의 영향이 보이지 않아 東晉南朝시기의 고분 연구에 있어 남북의 차이를 고찰할 수 있는 훌륭한 재료이자 돌파구이다.

핵심어: 牛上頭묘지, 연대, 東晉南朝, 문화속성, 會稽謝氏

5. 「뉴미디어 맥락에서 박물관의 진정성 있는 커뮤니케이션 전략」(郭美廷)

제요: 진정성은 박물관의 독창성을 측정하는 기본 지표이다. 전통적인 박물관의 맥락에서 진정성은 원시 문물과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다. 비물질화 커뮤니케이션이라는 뉴미디어 맥락에서, 진정성 있는 커뮤니케이션 방식은 문물, 관람객, 박물관이라는 세 가지 차원에서 변화되어 문물 정보에 대한 의문, 관람객 특징에 대한 무관심, 박물관 해석에 대한 논쟁 등의 문제가 나타나고 있다. 이에 뉴미디어 맥락에서 박물관의 진정성 있는 커뮤니케이션은 재현, 구축, 해체, 재구성의 4가지 차원에서 전개될 수 있으며 문물의 가치를 발굴하고 시간 흐름에 따른 서사를 강화하며 관람객의 상상력을 분석하고 신뢰 공동체를 구축하는 등의 조치를 통해 사회 대중의 인식과 진정성을 최적화하고 공공 문화 서비스의 수준을 향상시킬 것이다. 나아가 뉴미디어는 문물 정보의 해석 및 보급, 문화 계승과 발전을 촉진하며 중국의 정신력을 결집시키는 중요한 위치가 될 것이다.

핵심어: 박물관 커뮤니케이션, 뉴미디어, 진정성, 관람객

(翻譯: 朴炫真)